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及其启示

雷志敏 张家燕

(四川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大西南军政要务, 就如何做好西南边疆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 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 对今天加强新时代边疆民族团结、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具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 西南地区; 民族团结思想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999(2018)03-0032-04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坚持民族平等及平等基础上的团结联合, 习近平同志更是明确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回望历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军政两年多, 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结合西南边疆实际, 就如何加强西南边疆民族团结, 发展民族经济, 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本文试图以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为主要研究文本, 结合邓小平在此期间的民族工作实践, 对其民族团结思想作一初步的梳理, 为推进新时代边疆民族团结、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历史的借鉴与启示。

(一) 战争年代 “邓政委像我们壮家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团结。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的邓小平, 其新中国成立初的边疆民族团结思想, 缘于他在革命战争

年代民族地区的实践活动及其总结。他最初接触中国边疆民族问题是在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左右江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壮族占85%, 汉族占10%, 其他少数民族还有苗族、彝族等。为了发动少数民族参加革命, 邓小平深入民族地区, 探索民族地区老百姓与汉族群众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心理特征, 和民族地区的首领如韦拔群、和下层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百姓交朋友, 任用少数民族干部, 针对性地提出平等对待壮族和汉族人民的政策, 其行动和理念受到老百姓的认同 “邓政委像我们壮家人。”^{〔1〕} 1935年10月初, 时任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邓小平随陕甘支队到宁夏这块以回民为主、伊斯兰教信仰为主的民族地区。每到一地, 他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广泛开展革命活

〔收稿日期〕 2018-03-06

〔作者简介〕 雷志敏(1962-), 女, 四川成都人, 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 张家燕(1993-), 女, 河南信阳人, 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思想政治教育。

动。1936年，邓小平带领军队向七营川、清水线进军。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回民工作中的指示》和以毛泽东主席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两个重要文件，使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方向，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一方面，加强政治宣讲，对所属部队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回民解放道路的主张，促进回汉民族的联合与团结；另一方面，向回族群众揭示其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的原因，团结回族群众反对国民党军阀政治压迫和苛捐杂税，同时，用红军的一系列实际行动感化回族群众。因为七营镇是回民聚居区，尊重回民宗教信仰，唤醒民族解放意识，成为邓小平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邓小平特意向部队发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住清真寺；二、不准吃猪肉，不准提“猪”字；三、不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的土豪。⁽²⁾部队掀起了尊重回民、尊重信仰、帮助回民的热潮，回民们亲身感受这是一支“仁义之师”、“回民的军队”。红军的爱民之情，换来回民们的拥军之意，纷纷参军支前，清水河畔变成抗日救亡运动的堡垒。正是民族地区的工作实践，积累了邓小平民族工作经验，为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主政西南开展民族团结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为了国家安全 “要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统计，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总数为126583万人，其中汉族11594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1064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8.41%。虽然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但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而且主要居住在边疆各省、各民族自治区，其中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还与边疆紧密相邻。西南的国境线有几千公里，在这漫长的国境线上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为此，20世纪50年代初期主政西南军政的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乎国防是否安全，边疆是否稳定。他认为“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³⁾。邓小平将边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升到是关乎国防安全的大局角度、国家利益的根本问题高度来认识，是符合世界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民族团结、国家发展要求的。

同时，邓小平更强调边疆民族团结关乎国家统一大业、关乎民族感情。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基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程度不及汉族地区，要真正成为亲密无间的大家庭，只有“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消除民族隔阂”⁽⁴⁾。1986年邓小平回答外国记者“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时指出，“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⁵⁾，“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⁶⁾。

1949年大西南解放后，面对大陆还未完全统一、解放战争还在向纵深推进的时局，邓小平认为消除隔阂、加强民族团结是西南局治理边疆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任务。“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⁷⁾同时，针对西南民族分布的广泛性和民族工作的艰巨性，邓小平将少数民族团结工作纳入西南区政治稳定和经济恢复发展并重的地位，认为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要“把西南的情况，同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系起来讲一讲”⁽⁸⁾。即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民族团结问题，这是做好西南工作的核心要义。

(三) “三不”原则：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自身发展意愿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始终关心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进程。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的列宁，在处理该国民族问题中，根据本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出解决民族问题的若干“不”与“要”的原则，如绝不容许对任何民族实现任何哪怕是极轻微的压迫，决不容许对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而且要求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要求广泛地自治并实现区域自治，自治区域也应当根据民族特征来划分；大民族要以对自己的不平等帮助少数民族事实上的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体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博大胸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做好中国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期，根据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搞好民族团结、做好民族工作，是要具备必要的思想和心理前提的。这个“前提”即尊重和团结少数民族，即改革“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邓小平认

为，搞好民族团结首先要消除大汉族主义。要实事求是地了解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不能将内地改革发展模式照搬于西南民族地区，要切实做到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族传统的尊重，在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民族传统前提下，在时机成熟时进行社会经济改革，这是西南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前提。

为此，邓小平提出“不轻率、不侵犯、不用外力”的“三不”原则。邓小平认为，少数民族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不要仅仅从管理者角度出发，不要轻率地提建议、提要求、发布政策，要善于从少数民族本身发展需要的角度出发，平等待人，措施有情有义，这是“不轻率”；做民族地区的工作，要切实遵守宗教民族纪律，绝对不侵犯少数民族经济或文化利益，不侵犯少数民族习俗。不仅不能侵犯，就是对少数民族征集公粮，也要照顾民族地区的实际困难，只能比历史上的征集少而不能多，这是“不侵犯”；民族地区不同于内地，不能如汉地一样运用外部力量去搞民族地区的阶级斗争。“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⁹⁾这是“不用外力”。

这个“三不”原则集中体现于“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程度有机结合”。西南民族地区的解放，实质是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为群众所有、民族地区发展为群众共同享用。民族区域自治即在党的领导下，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规定，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现在一些民族地区一听说要搞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¹⁰⁾，但是，不同的民族地区发展程度不一，更有各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也不能一刀切。对此，邓小平指出应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状况，从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不一定一开始就搞民族区域自治。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终究“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¹¹⁾，我们

不能操之过急。

（四）“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

民族工作要围绕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这个中心。邓小平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更是维护基本政治制度和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石。对于经济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关系，邓小平这样告诫：经济决定政治，如果市场、贸易、金融等领域出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就是空话，“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¹²⁾。那么，如何在经济上帮助民族地区发展呢？邓小平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树立切实服务于本地民生要求和扶持民族经济发展的执政思维。他认为少数民族如贵州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山里，能为他们解决诸如食盐等民生问题，就能得到少数民族的拥护；如果解决西康至今还没有解决的公路问题，让西康群众能将东西运出去，外面的东西运进来，就能得到西康民族地区人们的拥护。因为这些好处是原来千年所没有的，但是，我们要做好“吃亏”的准备，为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¹³⁾。其次，有效调动少数民族的内在发展动力。西南的解放，使西南民族地区有了一个从封闭落后的传统社会走向开放进步的新社会的契机。而要真正推进民族团结、共同繁荣，邓小平提出要以发展民族生产生活资料为基础，通过政策措施调动少数民族的内在动力，这是民族地区快速发展之道。由此，他提出要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¹⁴⁾。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展西南民族经济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地区缺乏的生活物资需要，因此，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¹⁵⁾。

（五）把握“同少数民族商量”的政治原则及方法

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邓小平强调要谨慎小心，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他认为政治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政治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民主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邓小平特别指出边疆民族地区长

期以来受大汉族主义及其民族压迫，所以政治上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所有改革措施，“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16]。尤其指出“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17]。针对一些同志想在民族地区搞阶级斗争的思想，邓小平提出要有正确的阶级斗争立场，现在不宜发动阶级斗争，首先要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因此，邓小平提出要寻找适合民族地区包括民主改革在内的政治建设的方式方法，譬如“可以采用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18]。只要通过民族地区代表们的讨论，就是决议有缺点和不足，少数民族也会拥护的。如何扎实做到“同少数民族商量”呢？邓小平强调搞好民族团结、统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要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工作思路和科学的方式方法。邓小平要求民族工作者必须事必躬亲，要善于以科学的方法手段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他认为民族工作要重情重义，要从尊重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习惯出发，将全心全意为民族地区服务的政治本色落实到被不同少数民族认同的方式方法中去；他强调要老实做人，不懂就不要装懂，以诚恳的政治态度求得民族地区人民从心底的认同和情感交融，这样才好同少数民族商量。他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19]。

针对边疆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民族隔阂和文化贫瘠及其文盲现象，邓小平提出要动员有文化知识的人去办学校，加快培养各种人才适应经济政治建设需要。循序渐进地开展文化教育，邓小平根据当时的状况，提出文化教育发展思路和步骤“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20]其二，办训练班搞好民族政策宣讲：“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策。”其三，“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培养西南少数民族干部，适应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这是解决民族地区人才匮乏问题的重要手段。

西南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地区，邓小平在主政大西南近3年的工作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于实际，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开展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提出民族工作的原则方针方法，形成以“平等、尊重、发展、共建”为特色的民族团结思想。在他以后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更强调民族地区的“政策是要着眼于把这些地方发展起来”^[21]。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进步。今天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但是民族地区的发展仍相对落后，当前影响我国民族关系尤其是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困境。在民族团结“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迈向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的关键时刻，重温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民族团结思想及其原则方法，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新时代民族团结、民族发展等问题仍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邓小平与广西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55.
- (2) 罗正楷等著. 邓小平早期革命活动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238.
- (3) [4]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邓小平文选: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61, 162, 162, 161, 164, 165, 166-167, 167, 167, 167, 168, 168, 169, 170, 170, 168.
- (5) [6]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70, 219.
- (21) 贺恒. 试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科学内涵 (J). 社科纵横 (新理论版), 2011, (2).

(责任编辑: 曾 敏)